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

长城

抗战史

邓一民 群
马熙群 华
张丽华 著
张丽华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

主任：于林

副主任：李荒 李剑白

委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俊儒	白锁	艾鸿举	吉炳轩
吕钦文	孙继武	步平	杨光洪
李成	李亚泉	沈显惠	单荣范
张锡林	张殊凡	胡厚钧	盛彦
傅贵武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

主编：孙继武 步平

副主编：孙玉玲 孙继英 李茂杰 辛培林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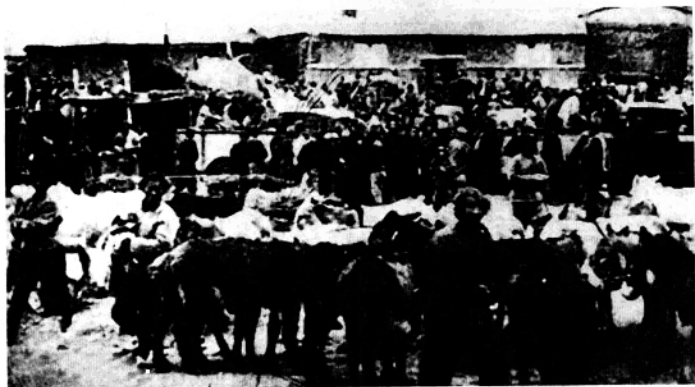
马越山	王希亮	邓一民	齐志刚
庄严	杨玉林	金耀东	张凤鸣
范广杰	郑敏	赵冬辉	郭素美
常城	霍燎原		



驻守山海关之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第六二六团团团长石世安及其守兵。



宋子文、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前排自右至左：汤玉麟、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作相。



北票民众用自家的骡马为义勇军运送粮草。



华北各界民众集会沉痛追悼长城抗日烈士。



生火待发的
日军铁甲炮车。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序言

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在漫长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日本侵略者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侵略气焰最为嚣张。日本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南割台澎，北侵“满蒙”，1931年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举进攻我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满洲国”，使东北沦陷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达十四年之久。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国土沦丧，民族屈辱，人民的苦难罄竹难书！

东北沦陷十四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难痛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极为残暴的篇章。在这十四年中，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实行惨无人性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从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严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将东北变成了压榨人民的牢笼和扩张的基地。

日本侵略者疯狂残酷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这十四年，在东北的大地上，反侵略、反掠夺、反奴化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举世罕见。

这些抗日救国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援，汇成了伟大的抗日爱国斗争的洪流，表现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誓死不屈的爱国传统，不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45年，东北人民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在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东北沦陷十四年这段历史启迪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人民手中无权就会陷入极端悲惨的命运；人民觉悟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前赴后继，团结奋进，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改地换天。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段屈辱的悲惨的历史，一定要振作民族精神，砥砺斗志，振兴中华。

今天，日本侵华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往来的新时期早已开始，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不忘过去和向前看。十四年的侵华战争，日本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坚信日本人民也会以史为鉴，坚持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不许军国主义复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样，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但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不但竭力掩盖日本侵华的罪行，而且公然散布“侵略有功，侵略有理”的谬论。近年来，他们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回忆录”，只字不提侵略，大肆喧嚣什么日本“进入满洲”是为了“防卫满洲”，是为了“满洲的近代化”，是为了“亚洲的复兴”等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十分“惋惜”，还念念不忘他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有的甚至

为战犯翻案，企图篡改和歪曲这段历史。对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正视历史，总结历史的教训，将战争的悲惨事实、将历史的真理告诉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仍是中日两国史学工作者共同的任务。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东北沦陷十四年历史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为了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为了在记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了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我们在中国共产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东北三省和原热河省的部分历史工作者，对东北沦陷十四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以《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为主体的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充分揭示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和全貌，彻底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批驳美化侵略、掠夺、奴役和欺骗人民的种种谬论，控诉和记录日本侵略者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讴歌东北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直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的光辉业绩。我们力争这套丛书能够达到较高水平，能给史学研究增添新的成果，同时希望它有助于各国人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

今天，屈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东北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让我们以史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勇往直前！

在编著这套丛书时，曾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热心的指导，得到国内外历史学界专家朋友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各档案馆、图书馆在资料方面给予了极大支持。我们感谢之至。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许多领域和理论问题，丛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于 林 李 荒 李 剑 白

代序

论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

邓一民

本文仅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七七事变 6 年局部抗战的成因、抗日的主体及向全面抗战的转变等问题谈些粗浅意见。

一 抗日战争局部抗战阶段的成因

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从此开始。但由于日本实行不宣而战的逐步推进的战争策略及国民政府执行不敢宣战的有限的抵抗政策，全中国性的抗战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才爆发，这就形成了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及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达 7 次之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首先揭竿而起的是东北义勇军抗战，他们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继之而起的是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接着又相继爆发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及绥远抗战等。

仔细研究上述 7 次抗战的缘起、发展和结果，可发现如下几

个特点：一是战争的主体和客体始终未变，抗日的主体是中国民众和军队，客体是日本侵略军及伪军；二是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一样的，即日本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三是每次抗战虽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间断地进行的，是一个整体；四是每次抗战的结局都是以暂时的局部妥协或失败（抗联抗战、绥远抗战除外）而告终，没能引发全面战争，但又与全国抗战有联系。这几个特点说明，七七事变前的6年抗战和事变后的8年抗战，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的一面，在于战争性质的一致性及其主客体双方的扩大性；相互区别的一面则在于战争的局部性和妥协性。这种情形表明七七事变前的6年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不是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而是部分民众和军队的局部抗战。

抗日战争中这一局部抗战阶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战争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采取不宣而战，逐步推进，接连侵占中国领土的有限战争政策，这是形成局部战争阶段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法西斯组织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当时执政的所谓“政党内阁”，虽然在侵华总目标上与日本军部、关东军是一致的，但在实施步骤上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日本政府内阁几次更迭，先后发生了多次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变，直到1936年3月广田弘毅组成了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使军部成为日本政治主宰，日本法西斯政权体制才最终确立起来。日本法西斯军事政权确立后，加速了军事化的步伐。国内的新老财阀都极力支持法西斯政权，支持战争，实现了“军财联袂”，使直接军事费用由1931年的4.55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0.9%，剧增到1936年的10.78亿日元，占国家总

支出的47.2%^①。日本的总兵力由1931年的23万人，剧增到1936年的56.4万人。同时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迅猛发展，具备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实力。1936年10月1日，日本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完成了“准战时经济体制”^②。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法西斯侵略集团也已经形成。这样，国际国内的条件都已经成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次，被侵略的一方——中国，当时政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尚处在形成过程中，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出发，对日本发动的局部侵略战争抱有种种幻想，不愿也不敢发动公开的全面抗战，只好采取“不抵抗”或“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政策。实际上推行一条以妥协退让为主，以有限抵抗为辅的政策，这就迎合了日本的有限的逐步推进的战争策略，使局部抗战阶段得以形成。

国民政府不敢公开对日宣战，有其内部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政治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刚刚建立不久，还不巩固，内部政治纷争，派系倾轧；大后方的云、贵、川三省鞭长莫及，还没有完全置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推行一套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镇压了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大规模“围剿”红军，迫使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在“围剿”追击红军的同时，解决了对云、贵、川三省的统一问题。这些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独裁统治。在经济上，自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即进入了

①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②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1979年版，第67页。

国家官僚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时期，通过建立“四行二局”和其他官僚资本机构，开始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统制。后来又经过“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统一币制，国民政府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最终形成。

国民政府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从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和经济体制出发，对日本发动的局部侵华战争，采取以妥协退让为主，以有限抵抗为辅的反动政策和策略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国联的调停和西方大国的对日绥靖政策，也是造成局部抗战局面的原因之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在于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独霸亚洲和世界。但在一段时间里，日本不敢同西方大国公开抗衡，所以主要采取对华有限战争和拉拢西方的策略。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大国从本国利益出发，一方面限制日本扩大向南侵略；另一方面又企图把祸水推向北方的苏联。这就形成了对日本的侵略活动既限制又支持的两面政策，《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就是这种政策的典型产物。直到日军侵占热河，染指华北，直接威胁到西方大国在华利益的时候，英美才指责日本想当东方霸主，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支持中国抗战的措施。1935年日本继退出国联之后，又废除了《华盛顿条约》，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到这时西方大国才比较认真地转到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上来。这对中国全国抗战的早日到来无疑是个推动。

二 中国民众是局部抗战的主体

本文前面列举了局部抗战阶段进行的7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如对这7次抗战的主要参加者进行分析，即可发现局部抗战的主体既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军队，而是中国民众。

东北义勇军抗战、察哈尔同盟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都是民众自发的武装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则

是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由部分国民政府军队发起，并得到国民政府一定支持的抗战；抗日联军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众的抗战。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民众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站到了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局部抗战的主体。

把 1931—1937 年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提出期（1931 年 7—12 月）。早在 1931 年 7 月，日军在东北一手制造了“万宝山惨案”，继而又在朝鲜掀起暴力排华风潮，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各地纷纷成立“鲜案后援会”、“反日援华会”等组织，举行示威游行，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做了舆论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更加激起了全国同胞的义愤，各地抗日运动蓬勃兴起，首先喊出“抗日救国”口号的是北平的大学生。9 月 20 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发出《反对日寇侵占东北要求一致抗日》的通电，并发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抗日救国宣言》。“通电”和“宣言”提出了“立息内争，一致对外”和“抗日救国”的口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及其路线产生的雏形。27 日，流亡在北平的 31 名东北知名爱国人士率先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随后，各地的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原来的“鲜案后援会”等组织也改变为抗日救国组织。在此期间，上海 800 多个团体 20 多万人和北平 250 多个团体 20 多万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再次提出了“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抗日救亡路线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

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也起来要求举国一致抗日。王造时提出了“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的主张。1931 年 12 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 60 多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发表宣言和通电，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这样，就掀起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浪潮。但在这一阶段，大多数人还

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来领导抗日。

第二阶段为确立期(1931年12月—1934年4月)。1931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揭开了反蒋抗日的序幕。17日,国民政府当局制造珍珠桥惨案,屠杀了到南京示威请愿的爱国学生30多人,全国为之震惊。上海12万群众抬着死难者的棺材游行抗议。紧接着,国民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加紧“围剿”红军,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取消抗日救亡组织,逮捕杀害抗日爱国人士,使刚刚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这使人们依靠国民政府领导抗日的希望破灭。

在困难时期,真正举起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大旗的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严厉批判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要抗日救亡,必须给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这就把抗日救亡运动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正确路线。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继而又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提出派全国80%的军队抗日、武装民众、恢复民主权利、停止进攻苏区的四项全面抗战要求。但国民政府于1933年5月强令解散“国民御侮自救会”,并拘捕其成员60多人,国民党特务又于6月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使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又一次遭受挫折。

第三阶段为发展期(1934年4月—1935年8月)。在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和国民政府强化独裁统治的形势下,1934年4月20日,由宋庆龄领衔,有1779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公开发表。这个纲领的贡献在于,它把日本侵略者、卖国贼作为打击对象,第一次提出了在国际国内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把斗争重点开始由阶级矛盾逐渐转移到民族矛盾上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做了准备。它得到社

会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纲领上签名者达10万多人。5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并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在北平和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分会，在一些大学成立了小组，开展了活跃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四阶段为转折期（1935年8月—1936年12月）。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生新的转变。12月，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1936年上半年，在上海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救国会发表了成立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在纲领和宣言中，号召“全国人民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政治主张如何”，都要“团结一致，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①；呼吁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各自作出让步，以利团结抗日。这对促进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民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深入发展。

第五阶段为完成期（1936年12月—1937年7月）。1936年12月爆发了西安事变，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标志着中国经过一段曲折之后，终于走上了团结抗战之路，持续5年多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出了胜利的果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走上了全民族抗战之路，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核心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完成了它的任务。

三 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转变

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转变，主要是由两个条件

^① 尚明轩等：《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决定的：一是国民政府由不抵抗，到“一面抵抗，一面谈判”，再到全面抵抗的转变；一是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也就是由阶级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转变。正是这两个转变，把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推向了全面抗战，而促使这两个转变的条件则是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形成、发展和最终破产，是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的显著特点。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内容对内是指共产党、中国民众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对外是指日本侵略者。二者的关系则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就不能攘外，这个政策实质上是以“剿共”和在国民党内排除异己为前提条件的有条件的抗日论。

“安内攘外”的方针，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告全国同胞通电中就提出来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尖锐起来，国民政府本来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彻底放弃这个方针，团结全国民众共同抗日，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仍顽固坚持执行并强化这一反动方针。1932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后，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方针，并调大军对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日本则乘机侵占热河，逼近长城沿线。结果国民政府军队长城抗战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是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严重打击。如果国民政府及时改弦更张，站到团结抗日的立场上来，为时未晚。但国民政府一意孤行，又对工农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把“安内攘外”政策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却丧失了全国

民心，并且招来日本的加紧侵略扩张，致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引起英美等国家的不满，这些都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才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日谈判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西安事变进一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转向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就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从此，国民党“安内攘外”的理论，被共产党和中国民众的全民族抗战理论所战胜和代替。从而，也把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抗战推向了全民族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尚处于国民政府军队“围剿”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毫不动摇地站到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前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为全国抗战的早日到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一段时间内，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也曾发生过路线上的偏差。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口号，甚至把中间党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使党脱离群众，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这两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怎样抗日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两个文件仍然没有脱离“反蒋抗日”的方针。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排除了“左”的干扰，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1936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